

流入地特征会影响流动家庭的亲子居住分离吗？

许庆红 王英琦 李龙飞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特征数据，考察了流入地特征对流动家庭亲子居住分离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家庭选择流向城市不仅因为对应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较大，从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就业概率；同时还是为了享受城市的基础教育服务。相比“乡—城流动家庭”，城市人均GDP、产业结构、基础教育、年均工资水平对“城—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城市房价对“乡—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伴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的加强，政策制定者应正视流动家庭（特别是“乡—城流动家庭”）的现实需求，更好地促进流动家庭的亲子团聚。

关键词：流入地特征；亲子居住分离；流动家庭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的深化，人口流动浪潮从个体性迁移向家庭化迁移转变的趋势日趋凸显。其中流动儿童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移民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达1367.10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019.24万人，而相比2010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1167.17万人）增长了17.13%，而农村留守儿童数相比2010年（2271.51万人）则减少了11.10%（教育部，2010，2015）。这表明2015年仅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就有大约四成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随迁并在城市接受教育，越来越多的家庭中夫妻外出打工的同时将未成年子女也带入城市的比例日益增大。我国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已进入第二阶段，即从夫妻团聚向父母与子女团聚的阶段过渡。

家庭团聚是一项基本人权，对流动人口本人的生存发展，对其家庭的和睦稳定，对整体社会的和谐凝聚都有重要的作用。而居住分离既是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其社会后果之一（Fan，2011）。流动人口的直系家人，特别是未成年子女跟随父母流动到城镇，有利于儿童自身的身心健康成长；但同时也给家庭带来更高的生活成本，以及教育、医疗等相关社会服务资源的需求。未成年子女是否随迁一方面可能是家庭经济效用最大化的一种策略选择；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流入地公共政策的包容和接纳程度（杨菊华，2015）。那么，当前我国流动家庭对其未成年子女的居住安排是如何决策，是留守还是随迁？

作者简介：许庆红，社会学博士，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流动人口问题、社会分层与流动。王英琦，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人口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流动人口问题。李龙飞，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云南大学东陆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高地项目”、“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创新团队”的支持。

未成年子女未能与父母随迁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本研究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下简称“监测数据”),描述流动家庭的亲子居住分离状况和主要特点;从流入地特征角度探索导致流动家庭亲子居住分离的相关因素;并对如何促进家庭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家庭团聚的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将家庭界定为核心家庭,亲子居住分离界定为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与父母(或父母其中一方)未共同居住在流入地的情况。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伴随2000年以来家庭化流动成为人口流动的新趋势以来,研究者就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规模、过程与特征进行了研究。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规模方面,周皓根据“五普”数据计算,2000年户主和配偶均为迁移人口的纯外户比例高达47%(周皓,2004)。李强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估计,全国有1/4的外出者是举家外出,而在北京、武汉、苏州、深圳和上海,有1/3的农民工以家庭形式居住在一起(李强,2014)。盛亦男基于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计算,外出人口中2人户到4人户合计占70%(盛亦男,2013)。杨菊华同样基于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计算出近2/3的核心家庭实现了完整家庭式流动(杨菊华,2013)。韩淑娟利用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得出山西有72.26%的流动家庭已经实现了举家迁移(韩淑娟,2016)。尽管上述研究的数据和统计口径未必相互可比,但都指出了核心家庭举家迁移这一重要的人口流动趋势。

同时,以往对影响流动家庭迁移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

一是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新迁移经济学充分考虑到家庭在迁移过程中的作用。迁移流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使家庭承受的风险降低到最小(Massey et al.,1993)。已有研究发现,迁移家庭的基本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家庭的经济状况等是影响家庭做出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如家庭规模越小、户内结构越简单、家庭化流动越易发生(袁霓,2008);农村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女孩处于明显的劣势;同时学龄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小学在校和初中在校的流动人口子女(吕利丹等,2013)。流动家庭在流入地城市的月收入越高,流动家庭举家迁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而往老家汇款金额越多,流动家庭的完整程度越低(杨中燕等,2015);先行迁移者的外出经历,是促使家庭成员后继迁移的主要因素(杨云彦、石智雷,2008)。

二是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它被广泛应用于考察家庭特别是核心家庭一系列的社会行为的时间选择问题。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结婚和生育是两个重要的事件并以此作为划分家庭生命周期的标志。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的阶段对家庭迁居方式的决策有密切关系,家庭迁居的方式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婚姻会提高举家迁移的可能性(邵岑、张翼,2012;洪小良,2007),但子女数量的增多可能会增大流动家庭分居的可能性(杨中燕等,2015)。而有关非劳动年龄家庭成员是否会阻碍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尚存争议,有的研究发现孩子和老人会降低夫妻外出的可能性(盛亦男,2014;周皓,2004),但另外的研究得出有学龄前及学龄期的子女更可能推动夫妻参与外出;仅当子女还是婴儿时,妻子更可能会单方留守(李代、张春泥,2016)。

三是制度性与结构性壁垒。制度性壁垒主要指由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差异,它将中国人分为农村人和

城镇人,形成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户籍制度也将流动人口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同样作为外来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始终不能摆脱农民的身份,具有作为农村人和外来人的双重劣势。已有研究发现,乡—城流动人口比城—城流动人口更可能与核心家庭成员分离居住,而且流动人口与家庭成员分离居住的比例随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的加大而增高,即随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市内跨县流动的比例依次递减(杨菊华、陈传波,2013)。这表明流动模式不仅受制于户籍性质,还受制于户籍地点,以及制度和结构制约的程度(杨菊华,2015)。结构性壁垒主要体现在中国地区间发展的巨大差距,主要体现在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的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中,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最高,家庭成员团聚的频次较少、间隔较短;而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之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都低(杨菊华,2013)。

此外,在流入地特征方面,根据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人口流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该地区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维持在2/3左右。同时流动人口向特大城市聚集的态势还在加强(童玉芬、王莹莹,2015)。与早期研究认为的经济利益始终是人口自主迁移的最根本因素(周吉节,2000)不同,近期研究发现相比2000年,2010年经济发展水平对吸纳外来劳动力的作用在减弱。劳动力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高的就业概率,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但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系数仍然小于工资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夏怡然、路铭,2015)。张耀军等认为第三产业的发展 and 较高的职工工资是城市吸引省内和省外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社会公共资源对省内人口流入影响较大,而就业率和城市化水平对省外人口流入影响较大(张耀军、岑俏,2014)。流入地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具有显著影响(童玉芬、王莹莹,2015)。另一些研究比较了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性和公平性方面的差异。如北京一直致力于加强创新管理和服务,并将流动人口纳入顶层设计,制定了功能区和产业发展建设规划,引领流动人口实现合理有序的流动(余荣华,2013)。而深圳是一个典型的年轻化移民城市,非户籍人口服务管理面临严峻挑战,比如非户籍人口信息统计难度大、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短缺、社会治安管理形势严峻、管理法规体制不完善、教育程度较低且多元文化碰撞等(牟彤华、王雪,2013)。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造成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出现不同的结果。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依旧存在以下不足:(1)家庭有单身、核心家庭、扩展家庭等多种形式。尽管绝大多数流动家庭的研究将流动家庭界定为核心家庭,通常采取将所有扩展家庭都分解为多个核心家庭的做法,却没有严格区分核心家庭中子代的年龄与是否婚育(如李代、张春泥,2016),而事实上如果一个扩展家庭(分为父辈、儿辈和孙辈)中儿辈通常已经成家,很有可能已经单独居住,我们更关心的是儿辈与其未成年的孙辈是否同住;(2)个体或家庭特征如何影响个体迁移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陆铭,2011),但对家庭化迁移而言,流入地特征比如平均工资收入、居住成本、公共服务等对家庭成员能否流动的影响也很重要。而目前有关流入地特征的研究主要涉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就业机会多寡等,缺乏整体的分析。本文将分析流入地特征对流动家庭的亲子居住分离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影响流动儿童随迁因素的认识,对制定和完善流动儿童相关福利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二)研究假设

城市人均GDP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机会。已有研究发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半家庭式及家庭式迁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式迁移的发生比越高(王文

刚等,2017)。本文对此进行检验,即假设1:城市人均GDP越高,流动家庭的亲子居住分离的可能性越小。

其次,流动人口往往趋向于向就业就会多和工资收入高的城市聚集。那么,城市平均工资越高,同样也能促进流动家庭的家庭化迁移。因此得到假设2:城市平均工资越高,流动家庭的亲子居住分离的可能性越小。同时,伴随近年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二产业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在降低,而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高的城市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在增强(夏怡然等,2015),从而能够为流动家庭的家庭成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得到假设3:城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比值越高,流动家庭的亲子居住分离的可能性越小。

同时,伴随人口城市化的推进,人口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而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父母可能更多地考虑其基础教育的享有机会和质量。得到假设4:城市的基础教育越好,流动家庭的亲子居住分离的可能性越小。此外,对流动家庭而言,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去买房或租房才能增加其家庭举家迁移的可能性。一般房价较高的城市,通常房屋租金也越高。高房价会成为抑制人口流入和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重要因素。因此得到假设5:城市平均房价越高,流动家庭的亲子居住分离的可能性越大。

最后,目前文献中关于流入地特征对流动家庭亲子居住分离影响的城乡异质性分析还相对较少。但在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乡家庭在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城乡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构成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基础性的不平等结构。无论是部门进入、职业获得还是工资收入水平,相比城市户籍劳动者,农村户籍劳动者总是处于劣势地位(李骏、顾燕峰,2011)。因此,本文还对乡—城流动家庭与城—城流动家庭之间的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个体和家庭层面数据来自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组织协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具体实施调查。样本的抽样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2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抽样总体为调查前一个月来本地居住、非本区(县、市)户口且至2015年5月年龄在15周岁以上的流动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除外)^①。实际调查的有效样本为20.62万人。城市层面数据基于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统计年鉴》计算得出。本文选择已婚、有配偶且目前育有未成年子女(子女年龄为0~17岁)的流动家庭样本。将个体和家庭层面数据与城市层面数据匹配后,获得109915个样本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二)变量界定

1. 因变量

以往依据家庭功能的完整程度划分为四种流动模式,依次为举家迁移、夫妻与子女分居、夫妻一方携子女流动与夫妻一方独自流动(杨中燕等,2015)。本文重点考察亲子之间的居住分离,因此将因变量分为两类,一是亲子团聚型,二是亲子分离型,包括亲子部分分离(具体包括夫妻二人和部分未成年子女、夫妻

① 注:关于抽样的具体情况,参见国家卫生计生委编,2017,《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第222~223页。

一方和全部未成年子女、夫妻一方和部分未成年子女)和亲子完全分离(具体包括夫妻二人和夫妻一人两种流动类型)两种类型。

2. 自变量

涉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流入地特征两组变量。

其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变量来测量,包括家庭在本地的人均年收入和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

其二,流入地特征包括如下变量:

人均GDP:流入地的人均GDP由各城市GDP除以2014年的常住人口计算得到,单位为“元/人”,用来衡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平均工资:用各城市2014年职工年平均工资来测量。

产业结构:2014年各城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比值。

基础教育:2014年各城市100名小学生中的小学教师数来表示。

房价:2014年各省(直辖市)平均房价^①。

3. 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与家庭成员分离居住的比例随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的加大而增高,即随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市内跨县流动的比例依次递减(杨菊华,2015)。同时,随着家庭中孩子数量的(15岁以下家庭成员)增加,家庭式迁移的发生比显著提高(王文刚等,2017)。因此,本文将家庭迁移范围和子女数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数据匹配地级市或省级的城市特征数据,采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来检验流入地特征对流动家庭亲子团聚与否(1为亲子团聚;0为亲子分离)的影响,同时流入地特征对乡—城流动家庭和城—城流动家庭的亲子居住安排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下文将对乡—城流动家庭和城—城流动家庭两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变量的基本特征描述参见表1。

表1 变量基本特征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因变量		乡—城流动家庭样本	城—城流动家庭样本	全部流动家庭样本
流动家庭类型(%)	1=亲子团聚	64.98	71.38	65.87
	0=亲子分离	35.02	28.62	34.13
自变量				
家庭年收入(元,log)	均值	10.10	10.36	10.14
	标准差	0.59	0.65	0.61
父母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	9.11	1.81	8.09
	2=初中	59.08	22.47	53.96
	3=高中(中专/中技)及以上	31.81	75.72	37.94
城市人均GDP(元,Ln)	均值	11.06	11.10	11.06
	标准差	0.51	0.49	0.51
城市年平均工资(元,Ln)	均值	10.96	11.02	10.97
	标准差	0.23	0.27	0.24

①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由于无法找到全部城市的市级房价数据,故用省级房价数据来代替。

(续表1)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产业结构	均值	1.10	1.38	1.14
	标准差	0.71	0.97	0.76
基础教育	均值	5.88	5.91	5.88
	标准差	1.07	1.01	1.06
房价(元/平方米, Ln)	均值	8.78	8.89	8.80
	标准差	0.40	0.48	0.41
控制变量				
迁移范围	1=跨省迁移	50.85	48.08	50.47
	0=省内迁移	49.15	51.92	49.53
子女数(个)	1=独生子女	53.85	77.01	57.09
	2=2个子女	40.72	21.38	38.02
	3=3个及以上子女	5.42	1.61	4.89
样本量	-	94,563	15,352	109,915

四、数据分析结果

表2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流入地特征对流动家庭亲子居住分离影响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数据的聚类可能带来标准误估计的偏差,本文使用稳健标准误予以修正。

表2 流动家庭亲子居住分离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

模型1	变量	风险比	标准误
家庭SES	家庭年收入	1.577***	(0.023)
	父母教育(小学及以下)		
	初中	1.300***	(0.022)
流入地特征	高中(中专/中技)及以上	1.357***	(0.026)
	城市人均GDP	1.530***	(0.030)
	城市年平均工资	0.619***	(0.033)
	产业结构	1.488***	(0.016)
	基础教育	1.207***	(0.008)
	房价	0.460***	(0.012)
控制变量	迁移范围	0.596***	(0.009)
	子女数(1人)		
	2人	0.746***	(0.011)
常数项	3人及以上	0.602***	(0.018)
		6.782***	(2.734)
Log pseudo likelihood	-67035.839	-	-
Pseudo R ²	0.049	-	-

注:(1)N=109915;(2)* sig<0.05, ** sig<0.01,*** sig<0.001。

模型1考察了全部流动家庭的亲子居住分离的影响因素。首先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庭的年收入(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其亲子团聚的优势比(odds ratio)就提高57.7%。相对于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家庭而言,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家庭亲子团聚的优势比提高30%,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家庭亲子团聚的优势比则要高35.7%。

其次,在流入地特征方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市人均GDP的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亲子

团聚的优势比就提高 53%。这说明城市人均 GDP 越高,流动家庭的亲子居住分离的可能性越小,证实了假设 1。同样,城市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与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的比值越高,以及城市基础教育的提高都对流动家庭的亲子团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证实了假设 3 和假设 4。但另一方面,房价和城市年平均工资却起到了抑制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作用。具体而言,房价每提高一个单位,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优势比就降低 54%,假设 5 得到了证实。同时城市年平均工资每提高一个单位,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概率就降低 38.1%,假设 2 没有得到证实。这可能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往往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有关。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城市平均高工资并不能代表流动人口实际所获的收入高。

在控制变量方面,家庭迁移范围和子女数对流动家庭的亲子团聚起到抑制作用。这说明跨省迁移和子女数超过 1 人的家庭,其亲子居住分离的可能性越大。

为了进一步考察流动家庭的流动特征与亲子居住分离之间的关系,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对乡—城流动家庭和城—城流动家庭进行分析(参见表 3)。

表 3 乡—城流动家庭与城—城流动家庭亲子居住分离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2:乡—城流动家庭		模型 3:城—城流动家庭	
	风险比	标准误	风险比	标准误
家庭年收入	1.484***	(0.024)	1.836***	(0.077)
父母教育(小学及以下)				
初中	1.247***	(0.023)	1.213***	(0.123)
高中(中专/中技)及以上	1.355***	(0.027)	1.304***	(0.124)
城市人均 GDP	1.486***	(0.031)	2.086***	(0.119)
城市年工资	0.617***	(0.035)	0.467***	(0.071)
产业结构	1.431***	(0.017)	1.625***	(0.048)
基础教育	1.199***	(0.009)	1.226***	(0.024)
房价	0.429***	(0.011)	0.714***	(0.053)
迁移范围	0.600***	(0.010)	0.638***	(0.027)
子女数(1 人)				
2 人	0.742***	(0.011)	0.788***	(0.036)
3 人及以上	0.604***	(0.019)	0.503***	(0.070)
常数项	36.885***	(16.285)	0.015***	(0.016)
Log pseudo likelihood	-58191.527	-	-8659.346	-
Pseudo R ²	0.050	-	0.058	-
n	94563		15352	

注: * sig<0.05, ** sig<0.01, *** sig<0.001。

从表 3 可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控制模型中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乡—城流动家庭和城—城流动家庭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收入对城—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积极影响(1.836 倍)要大于乡—城流动家庭(1.484 倍),而相比父母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家庭,父母教育程度为初中和高中,对乡—城流动家庭的积极影响(分别为 1.247 倍和 1.355 倍)则大于城—城流动家庭(分别为 1.213 倍和 1.304 倍)。这说明相对于城—城流动家庭而言,家庭人力资本更有助于提高乡—城流动家庭的亲子团聚概率。

其次,在流入地特征方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乡—城流动家庭,城市人均 GDP,产业结构还是基础教育对促进城—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和模型 1 的结果类似,房价和城市年平

均工资同样对乡—城流动家庭和城—城流动的亲子团聚产生抑制作用。但二者的作用大小却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房价每提高一个单位,乡—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优势比就降低57.1%,但城—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优势比仅降低28.6%。城市年平均工资每提高一个单位的对数,乡—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优势比降低38.3%,但城—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优势比则降低53.3%。这说明房价对乡—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城市年平均工资对城—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抑制作用更强。可能的原因是,对于乡—城流动家庭而言,高昂的房价(进而房租)使得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乡—城流动家庭比城—城流动家庭更难实现亲子团聚。同时,乡—城流动人口普遍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工作。为了在城市扎根,他们容忍着相对微薄的薪水和较差的生活条件,因此城市年平均工资对其家庭团聚的抑制作用反而弱于城—城流动人口。

最后,相比城—城流动家庭,家庭迁移范围和子女数对乡—城流动家庭的亲子团聚的抑制作用也更为明显。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的城市特征数据,研究了流入地特征对流动家庭亲子居住分离的影响,并比较了乡—城流动家庭和城—城流动家庭的差异。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都能显著促进流动家庭的亲子团聚。但分家庭类别来看,家庭年收入对城—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积极影响要大于乡—城流动家庭,而父母教育程度对乡—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积极影响要大于城—城流动家庭,这说明要进一步加大对流动家庭、特别是乡—城流动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制定各项教育和职业培训政策促进其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其在流入地城市实现亲子团聚。

其次,在流入地特征方面,第一,流动家庭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因为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产业发达,就业机会多,也希望能够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服务。基础教育越好的城市,流动家庭亲子分离的可能性也越小。相比乡—城流动家庭,城市人均GDP、产业结构和基础教育条件对促进城—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影响更为明显。第二,房价和城市年平均工资对流动家庭的亲子团聚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其中房价对乡—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城市年均工资对城—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的抑制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房价上涨对乡—城流动家庭亲子团聚更为不利。最后,相比城—城流动家庭,家庭迁移范围和子女数对乡—城流动家庭的亲子团聚的抑制作用也更为明显。

事实上,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公共服务水平好且工资水平也高的大城市集聚的状况,能够缓解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伴随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浪潮,政策制定者应正视流动家庭的现实需求,一方面要有效改善流动家庭的居住条件,为流动家庭,特别是乡—城流动家庭的租房租金补助、购房贷款提供一定的倾斜性政策。另一方面,对流动家庭的公共服务需求如基础教育需求、医疗服务需求等予以更多的重视,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内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促进流动家庭的亲子团聚。

本文曾在2017年6月上海大学“中国城市研究网络论坛”上宣读。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 韩淑娟,2016,《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模式及其特征——以山西省为例》,《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7期。
洪小良,2007,《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教育部,2015,《2010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5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站。

- 李代、张春泥,2016,《外出还是留守:农村夫妻外出安排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李骏、顾燕峰,2011,《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强,2014,《农民工举家迁移决策的理论分析及检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6期。
- 陆铭,2011,《制度制约下的劳动力流动与滞后的城市化》,陆铭、陈钊、朱希伟、徐现祥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吕利丹、王宗萍、段成荣,2013,《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中子女随迁的阻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为例》,《人口与经济》第5期。
- 牟彤华、王雪,2013,《深圳市非户籍人口服务管理问题探讨》,《经济研究导刊》第17期。
- 邵岑、张翼,2012,《八零前与八零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行为比较研究》,《青年研究》第4期。
- 盛亦男,2013,《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人口研究》第4期。
- ,2014,《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水平与迁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人口学刊》第3期。
- 童玉芬、王莹莹,2015,《中国流动人口的选择:为何北上广如此受青睐?——基于个体成本收益分析》,《人口研究》第4期。
- 王文刚、孙桂平、张文忠、王利敏,2017,《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特征与影响机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期。
- 夏怡然、陆铭,2015,《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 夏怡然、苏锦红、黄伟,2015,《流动人口向哪里集聚:流入地城市特征及其变动趋势》,《人口与经济》第3期。
- 杨菊华,2013,《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流动过程特征分析》,《人口与发展》第3期。
- ,2015,《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人口学刊》第1期。
- 杨菊华、陈传波,2013,《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流动过程特征分析》,《人口与发展》第3期。
- 杨云彦、石智雷,2008,《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杨中燕、朱宇、林李月、谭苏华,2015,《核心家庭人口流动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西北人口》第3期。
- 余荣华,2013,《北京:让流动有序让成果共享》,《人民日报》5月29日刊第17版。
- 袁晔,2008,《家庭迁移决策分析:基于中国农村的证据》,《人口与经济》第6期。
- 张耀军、岑俏,2014,《中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与省际流动影响因素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
- 周皓,2004,《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第6期。
- 周吉节,2000,《2000-2005年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分布状况和经济动因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
- Fan C. C. 2011.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Beijing's Urban Villages." *China Review* 11(2): 11-41.
- Douglas S. M, Joaquin A, Hugo, Graeme H et al.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3): 431-466.

Wi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stination Cities Affect the Parent-child Living Arrangement of Floating Families?

XU Qing-hong Wang Ying-qi LI Long-fei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5 and the urban characteristic data of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stination city on the living arrangement of floating families that whether the children are living together with their par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ies migrated to certain city not only attracted by the highe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job opportunities, but also 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services. And the effect of urban per capita GDP,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quality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on the reunification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urban-migrant families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rural-urban migrant families. However, housing prices have a greater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reunion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rural-urban migrants. To promote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igrant families and to improve their wellbeing, policy-makers should address the realistic needs of these families, especially the rural-urban migrant families.

Key words: Characteristics of Destination Cities; Parent-child Living Arrangement; the Floating Family

(责任编辑:李丁)